

# 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研究<sup>\*</sup>

◎徐唯燊 李鑫 聂新伟

**摘要:**随着全球力量此消彼长,香港正处在由国际金融中心向全球金融中心迈进的关键时期。尽管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美对华遏制态势给香港金融发展造成冲击,但新技术涌现和新共识形成也为香港部分金融领域后来居上奠定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应立足自身优势,找准“香港所长”和“国家所需”的交会点,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提升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吸引力,强化全球风险管理中心功能,全力打造亚洲金融科技枢纽,推动建设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枢纽,进一步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开放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 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依然稳固

经过多年努力,香港<sup>①</sup>已实现由区域金融中心

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性跨越,正处在向全球金融中心迈进的关键时期。香港金融监管体系成熟,营商环境公平公正,税制设计简单透明,为其持续拓宽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看,后疫情时代香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基础依然稳固。

一是香港拥有亚洲乃至全球顶级规模的金融市场。香港是全球第七大股票市场,截至2023年4月,港交所上市企业数量超过2600家,总市值达到35.9万亿港元。香港是亚洲最大的国际债券发行中心,2022年发行额达到1036亿美元,占比约30%。香港是除内地以外亚洲最大的私募基金枢纽,截至2022年12月末,约有630家私募基金公司,在港运营管理资本总规模约2080亿美元。在国际清算银行2022年外汇与衍生工具市场成交额调查中,香港继续保持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第三大场外利率衍生工具市场地位。此外,香港保险市场发达,2021年保险渗透率及密度排名亚洲第一位,在全球20大保险公司中,有12家在香港获授权经营

作者简介:徐唯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鑫,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聂新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2022年度重点课题“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项目编号:A2022051009)资助。

① 本文所有“香港”字样指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表 1 东盟与中日韩、发达经济体 GDP 占全球比重变化

年份	东盟与中日韩		发达经济体	
	GDP 占比 (%)	变化 (百分点)	GDP 占比 (%)	变化 (百分点)
2007	18.3	/	71.5	/
2008	19.3	1	68.9	-2.7
2009	21.3	2	68.6	-0.3
2010	22.5	1.2	65.5	-3.1
2011	23.5	1	63.3	-2.1
2012	24.7	1.2	61.9	-1.4
2013	24.3	-0.4	60.7	-1.2
2014	24.5	0.3	60.5	-0.2
2015	26.1	1.5	60.6	0.2
2016	26.7	0.7	61.2	0.6
2017	26.7	0	60.1	-1.2
2018	27.5	0.8	60	-0.1
2019	27.9	0.4	59.6	-0.3
2020	29	1.1	60.1	0.5
2021	29	0	58.8	-1.3
2022	27.6	-1.4	57.5	-1.3

资料来源：IMF

保险业务。

二是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持续稳固。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达到 9817 亿元，全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额达到 1434 亿元。依托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及多元的资金流通渠道，香港成为跨境资金进出内地的主要门户。2022 年，债券通“北向通”日均成交额达 322 亿元，占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整体成交额的 61%，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创 8 年来新高；人民币支付交易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 70% 以上；内地与香港跨境人民币支付日均交易额达 3490 亿元，占总交易额的 21%。

三是香港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领域上升趋势明显。金融科技方面，香港发布了“金融科技 2025”策略，构建起金融科技发展的整体框架，严谨的监管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推动了香港金融科技大幅增长，截至 2022 年 11 月香港的金融科技企业已超过 800 家，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获广泛认可，自 2016 年推出沙盒至 2022 年 12 月，共有 274 个金融科技项目获准使用沙盒进行测试。在绿色金融方面，香港多管齐下提升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地位，市场规模显著扩大，2022 年在香港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券总额达 278 亿美元，占亚洲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市场的 35%，2022 年 5 月首批总值 200 亿港元的绿色

零售债券发行，成为当时全球发行额最大的绿色零售债券。

## 二、新时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新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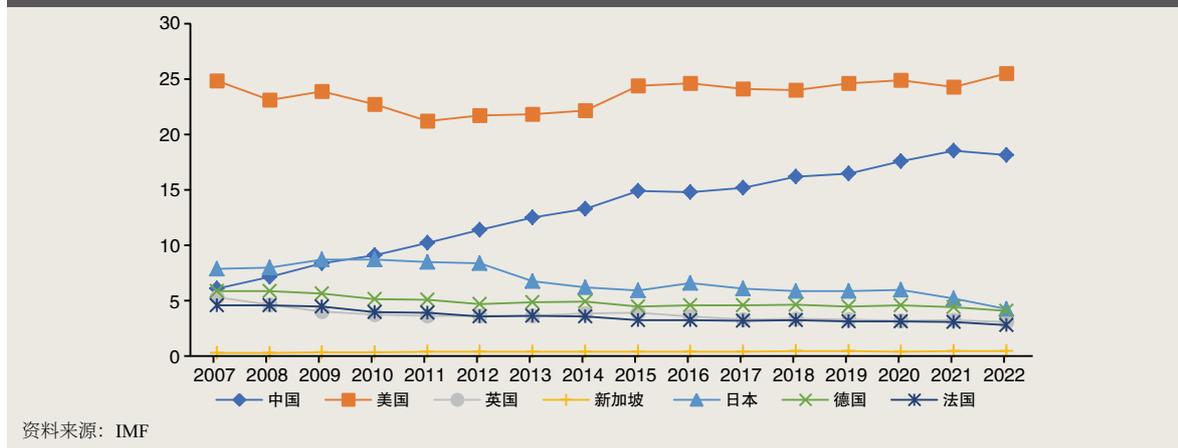
### （一）全球力量此消彼长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大趋势下，现代金融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中的引擎作用越来越明显。伴随现代经济体系的高度金融化，现代金融活动在空间维度上愈发集中于为数不多的个别国际城市，并最终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逐步建立起一个跨越国界、相互依赖、复杂的全球金融中心网络。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明显下降，加之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负面冲击的不对称性，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2007 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 GDP 的 71.5%，东盟与中日韩仅占 18.3%；而到 2022 年，发达经济体 GDP 的全球比重已下降至 57.5%，东盟与中日韩 GDP 的全球比重则上升至 27.6%（见表 1）。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东部的转移，也使过去的全球金融中心网络出现了裂痕。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则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图1 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所在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变化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中国GDP占到了全球的18.1%，仅低于美国7.3个百分点。然而，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国内地的金融发展水平仍然滞后，虽然近年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但与西方传统的英美模式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例如，金融市场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有待提升，境外投资者比重相对偏低；金融衍生工具种类不够丰富，市场定价能力仍需加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能力相对偏弱，与金融开放创新相协调的监管制度体系还需要继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还需加强等。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对金融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上海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全面建成前，中国需要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提升能级，共同作为开放桥梁和资本枢纽，以更好地融入金融化的国际经济体系，实现持续开放发展。香港长期以来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近年的国际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均位于前列。过去20多年香港的金融业表现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写照。面对全球金融中心网络的调整，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并加强与内地的联系，既有利于内地加快构建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提升全球金融资源集聚能力，更有利于香港抓住全球金融体系调整这个关键变量，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其在亚太区域乃至全球的金融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纽约和伦敦这两个全球金融中心“巨无霸”的追赶。

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秩序尚未出现实质性变革的情况下，内地发展仍有赖于既有的全球金融中心网络的部分功能。作为这一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香港，在继续发挥自由贸易港优势、服务内地内外联动和转型发展上具有不可替代的“超级联系人”作用。更进一步地，伴随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过去的全球金融体系对其制约作用将越发明显，中国必将围绕自身经济运行所依赖的金融资源谋求重构全球金融体系，可能需要克服中国与西方间显著的制度差异。此时，“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就成为中国与西方的缓冲区域，为内地政策信号的释放和双方制度的碰撞融合提供了平台，既有利于助推国家重塑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服务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更有利于香港逐步将金融发展优势由不可持续的与内地间的开放落差转向可持续的与内地同向并进的协同配合，并最终在有政府的作用下实现进一步跨越。

## (二)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逆全球化政策对香港金融发展造成冲击

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积累，弱化了香港金融业发展基础支撑。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使本已因疫情放缓的全球经济加速下滑，并导致供应链中断更加严重，粮食安全和贫困状况恶化，金融条件收紧，金融体系脆弱性进一步上升。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等不利因素短期难以消失，全球经济2023年反弹乏力，IMF预计未来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保持在约

3%。这是IMF自1990年以来作出的最低中期经济增速预测，远低于过去20年3.8%的平均水平。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全球经济的不景气限制了香港股票、债券、外汇、衍生品等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大，有碍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基础的金融市场广度的拓展。

另一方面，美国采取的逆全球化政策威胁香港乃至我国金融安全。产业方面，美国试图在关键领域延续对华“卡脖子”，谋求对华“断供”“脱钩”，打压中国发展；治理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强推“印太战略”，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挑起阵营对抗，实现对中国的经济遏制。更进一步地，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甚至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将多家中国公司列入“预摘牌”名单。预期稳定的制度环境和安全运行的基础设施是金融发展的软硬件基础，中美合作与斗争长期并存的态势不仅无助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关键的金融市场环境的营造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健全，也无形中增加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制度性风险，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 （三）新技术涌现和新共识形成为香港部分金融领域后来居上奠定基础

一方面，多种技术的协同并进有利于加深金融和科技融合程度。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的进展，深化了对市场行为数据的处理，增强了金融服务的时效性，提升了金融风险监控效率。数据挖掘技术的进步，提高了金融业可得数据集的颗粒度，有助于更精准地识别客户及需求，提前发现潜在风险，改进金融机构风险决策。云计算技术的进展，扩大了金融业信息共享范围，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保证了金融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了金融业的管理能力。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打通各监管机构间的沟通渠道，有助于通过分布式信任体系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数据造假等问题，也降低了金融机构对交易行为的监管成本，化解了传统风险管理手段的部分问题。随着各类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金融科技进入3.0时代，香港凭借自身金融和科技的双重领先，有机会在本轮金融科技浪潮中占据优势地位，推动金融业创新与发展。

另一方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一致性营造了绿

色转型国际环境。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各国（地区）纷纷出台政策措施：欧盟2020年公布7年1.1万亿欧元的中期预算提案和7500亿欧元欧洲复苏计划，聚焦绿色发展；韩国政府2020年发布“新政”，计划5年内投入逾千亿美元发展绿色经济，将韩国从能源依赖型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截至2021年，全球已有136个国家（地区）作出了净零排放承诺，这些国家（地区）GDP的总和占全球GDP的90%。净零排放和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的投资结构并创造大量新投资机会，要求金融体系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绿色转型，这就为香港发展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奠定了基础。

## 三、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思路定位

找准“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的交会点，是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关键。综合考虑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除了要做好常规的股票、债券、外汇及其他衍生品市场扩容、整体提高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外，更重要的是打造亚洲乃至全球金融格局中的“三中心两枢纽”。

一是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伴随主要金融市场指数开始加入内地在岸证券或提高其权重，流向人民币资产的境外资金将继续增加，而香港凭借联系内地资本市场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在促进国际投资者提高人民币资产配置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香港需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和工具，扩大人民币计价产品体系，深化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实现交易所买卖基金的“ETF”通，纳入更多金融产品，进一步巩固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二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伴随新法规及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加之香港拥有进入内地的独特优势及基金豁免缴税、附带权益税务宽减、外地基金迁册来港的优化机制，可为私募基金提供新的投资机遇。此外，“跨境理财通”成为便捷的跨境资产配置渠道，为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务提供了新活力和

新动力。香港需把握战略机遇、厚植发展优势，在推动基金投资活动方面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打造财富及资产管理枢纽。

三是全球风险管理中心。伴随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构建，香港需构建保险业生态系统，依托顶级的法律和会计服务机构，聚焦“一带一路”离岸项目转移和管理风险，提供专业风险管理服务和有效保险保障，丰富保险连接型证券产品，扩大再保险业务，拓展海事保险市场，实现向全球风险管理中心和区域再保险与保险枢纽的跃升。

四是亚洲金融科技枢纽。伴随银行及支付业开发和应用科技走向深入，香港需通过合规科技应用、评估、监管指引，促进银行研发和提供开放 API 以开拓创新服务，开发更多便利居民的金融科技方案，推动跨境贸易融资数字化，运用人工智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探索数字货币零售层面应用场景，实现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与内地建立一站式沙盒联网，提升在全球金融科技中的发展位势。

五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枢纽。伴随中国公布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大量内地企业面临绿色低碳转型，全球碳市场有望迎来显著增长，而香港为全球碳市场作出贡献的关键，就在于其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使全球资金可以流入内地碳市场。香港需丰富绿色债券发行的币种、模式和渠道，打造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发行的首选平台，优化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生态，探索成为区域碳交易中心和全球自愿碳市场，推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迈上新台阶。

## 四、香港更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重点任务

### （一）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一是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能级。加强顶层设计，实现香港、新加坡、伦敦等离岸人民币中心错位发展，推动香港在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和业务拓展上先行先试，增强香港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影响力。在不涉及跨境资金流动的情况下，推动有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香港本地法律法规、监管

要求发展人民币业务。加快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发展，增强离岸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有序扩大港交所“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及“双柜台庄家机制”范围，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和多元化机会。

二是打通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联系。加强香港与内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互动，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和上海在岸人民币中心合作，构建全球互联互通的人民币金融市场新格局，赋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优化人民币输出、境外流通和回流的良性循环机制，打通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联通不畅的堵点痛点。以拓展香港金融业发展腹地地为牵引，深化深港金融创新合作，推动前海成为香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后援基地。

三是推动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发展。打造多元化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开发以人民币计价或结算的贸易融资、避险保值等产品，提高人民币投资收益，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加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通道建设，丰富人民币投资产品种类和投资渠道，放宽投资比例限制，完善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管理。放宽内地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准入限制，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拓展人民币汇率衍生品、利率衍生品、信用衍生品以及其他结构化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类，优化衍生品交易结算机制，完善人民币计价风险管理工具，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试验田、防火墙的角色和功能。支持香港联合内地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提供投融资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 （二）提升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吸引力

一是丰富拓展资产管理主体。把握《有限合伙基金条例》颁布契机，推动各类私募基金集聚发展，发展股权转让受让基金和创投基金。培育更多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积极发展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推动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在资本市场挂牌上市。推动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在港资产管理机构深化合作，支持其设立专业资产及财富管理子公司或投资咨询子公司，积极引进更多证券、期货、信托等专业化机构。促进创投基金的跨境资本流

动，便利科技创新行业收入的跨境汇兑，探索香港金融对接内地科技产业的服务模式创新。推动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参与相关国债交易，探索香港合规资产管理机构参与内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管理的新模式。促进香港慈善基金会发展，进一步拓展优化其资产管理类服务功能。

二是创新资产管理产品服务。全面深化“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推动香港与内地银行开展全方位合作，加强账户基础、业务系统等硬件对接和营销服务、业务规则等软件衔接，加强对跨境资金的管理，形成投资户和汇款户的资金闭环汇划，推动内地与香港信息共享，构建纠纷解决机制，通过使用人民币结算降低汇兑成本。推动内地与香港将符合条件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ETF）纳入互联互通，丰富资产管理机构的投资渠道和交易品种。支持香港机构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参与投资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基金）。支持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放宽REITs投资限制及借贷比率上限，提高香港REITs多样性，提升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丰富固定收益产品和商品基金产品类别，为境外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多元化服务，健全家族信托服务标准。

三是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继续强化香港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为资产管理机构提供更多投资标的和对冲工具。推动股票、债券、外汇及其他衍生品市场提质扩容，进一步丰富相关产品，拓宽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加快发展期货市场，扩大商品期货国际化特定品种，提高香港在大宗商品定价领域的影响力，取得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宗商品的人民币定价权，创新发行国债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促进更多银行、保险机构和基金公司参与相关衍生品交易。畅通资产管理投资渠道，推动银行投资更多交易所债券及商品期货，促进保险资金依托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投资大宗商品。推动跨国公司在港设立全球或区域财资中心，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加强金融市场国际合作，拓宽证券交易互通、基金互认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发展存托凭证业务。

### （三）强化全球风险管理中心功能

一是打造区域再保险与保险枢纽。依托香港在全球航运业的地位及较为完备的海事法律服务体系，通过专项政策优惠等措施，以船壳和机械保险、货物保险和保赔保险为抓手，做强海事保险业务。吸引内地企业在港设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扩大其可承保风险范围，加大专业再保险公司政策支持力度，通过发展自保保险和再保险支持内地企业管理海外项目投资风险。完善“香港特殊风险合作平台”，便利专项风险领域供求匹配。以内地保险公司在港发行巨灾债券为抓手，着力构建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丰富相关证券产品，完善规管制度，推动香港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保险相连证券发行地。

二是利用保险科技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依托监管沙盒机制提供的包容性监管环境，支持保险机构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以及高维度、高复杂度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提升风险识别和决策能力，优化保险流程，拓宽保险蓝海市场，通过发展合规科技强化机构自身风险管理。推动虚拟保险公司快速发展，定期评估虚拟保险发展水平，适时放宽相应约束，创新虚拟保险产品，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借鉴“跨境理财通”的经验，与内地相关部门进一步探讨通过封闭式资金渠道实现跨境保险产品销售、理赔、提取现金价值等的可行性，探索推出“跨境保险通”。

三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项目风险管理。发挥香港全球顶尖项目咨询服务公司集聚优势，建立“一带一路”项目信息平台，为内地与香港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提供全面咨询服务。利用香港国际经贸规则与国际接轨的便利条件及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中的广泛影响力，有效缓冲和解决项目建设中由于标准规则不同引发的风险。发挥香港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作用，邀请相关银行、律师事务所、内地企业、贸易协会、保险公司等搭建融资合作平台，提升“一带一路”项目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用好香港仲裁机构专业水平和国际认可度高的优势，依托开放的签证制度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解决项目争端风险。

#### （四）全力打造亚洲金融科技枢纽

一是夯实金融科技发展的软硬件基础。超前布局金融科技相关新兴产业，促使技术资本、创新资本和企业家资本深度融合，引导社会资本有效投入金融科技创新领域。加快香港数码港、科技园、落马洲河套地区创新园建设，简化政府资助资金申请手续，吸引更多大型金融科技企业落户。促进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科技企业、高校等科研机构间协作，提高项目审核、数据处理、监管协调效率，开发更多便利居民的金融科技方案。强化“金融科技跨界别协调小组”作用，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支持香港金融科技生态建设与发展。构建多层次数字新基建，在底层搭建量子技术、云计算数字技术仓，在中层搭建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服务仓，在顶层搭建平台化数字供给仓。高度重视数据基础建设，推进“商业数据通”、企业版“智方便”和“区块链共享信贷资料平台”建设，在平衡隐私管理和数据共享下将散落数据整合，使银行与企业间数据流动更安全有效，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合作与共享机制。扩展金融科技人才库，完善“科技专才培育计划”，培育更多学生和银行从业人员成为全面的金融科技专才。建立国际学术合作网络，率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才流动和金融科技人才互认共享。

二是以监管科技引导银行数字化转型。支持银行在业务运作流程中全方位应用金融科技，推动香港金管局协助银行定期评估检视金融科技应用情况，便利银行采用创新科技。加强香港金管局与银行界及科技界在金融合规科技方面的合作，推动形成更具规模及更多元的合规科技生态圈，通过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使银行更加便捷高效地实现合规，减少银行的监管汇报负担与成本。加强银行应用新技术可能产生的操作和道德风险，以及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信贷评分可能造成的客户歧视等风险的防范。推动香港金管局与内地监管部门合作，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推进监管过程数字化。搭建监管数据共享平台和监管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算法能力，将资金量转化为信息流，把可疑资金交易转化为预警信息报送，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并通过技术能力予以阻隔。

三是抢占数字货币、虚拟资产发展先机。加大数字货币研发力度，率先推动数字货币在跨境资金调拨、国际贸易结算、资本市场交易等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升金融基建处理跨境支付能力。推动“数码港元”（e-HKD）研究和落地，继续研究批发层面的央行数字货币，并着力从消费者需求、数字货币使用场景、隐私保护和反洗钱要求、系统风险和政策要求等方面，推进零售数字货币项目试点和落地。加强香港金管局与中国人民银行的 合作，共同探索金融科技和央行数字货币在改善跨境支付、便利国际贸易结算等领域的作用，率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互联互通。实施“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提升货币桥的可用性、兼容性及多样性，探索与更多系统的灵活对接。探索数字人民币系统与“转数快”（FPS）快速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方式，提升支付效率和用户体验。遵循“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原则，推动虚拟资产创新可持续地蓬勃发展，按照国际标准缓减和管理在金融稳定、消费者保障和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方面所造成的实际和潜在风险。

#### （五）推动建设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枢纽

一是健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政策框架。推动金融机构建立气候风险管理架构，完善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流程，增强金融机构气候风险评估能力。在碳中和导向下，明确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支持方向，积极支持内地重点行业领域节能、降碳、增绿，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促进金融机构制定气候风险评估标准，加强风险分类管理和动态评估，对存在重大气候风险的客户实施名单制管理。构建促进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创新的体制机制，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下，创新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流程、产品和服务。积极衔接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CGT），探索构建适用于香港的绿色分类标准，使之与国际最佳做法接轨。完善金融机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业务标准，加强相关数据治理。

二是增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服务能力。继续开拓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市场，有序实施政府绿色债券计划，扩大债券发行的币种、模式和渠道，推广面

向个人投资者的零售债券，逐步形成多种类的绿色债券收益率曲线，为各类主体发行债券提供基准。吸引更多企业使用香港绿色债券专业服务，打造绿色债券发行首选平台。将 ESG 融入外汇基金公开市场和私募市场投资管理过程，在 ESG 投资同其他投资长线收益相近时，优先进行 ESG 投资，有序扩大外汇基金 ESG 投资所占比重。推动金融机构运用科技手段增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服务水平，完善新产品开发和投融资管理，增强管理覆盖面和有效性。积极支持“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建设，强化对拟授信和投资的境外项目的 ESG 管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合作，开展碳排放交易外汇试点，支持香港打造区域碳交易中心和全球自愿碳市场，推动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平台为绿色项目融资及认证，探索更多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及其他绿色金融产品，建设国际认可的香港绿色债券认证机构。

三是强化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推动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政策执行纳入内控合规范围，定期组织内部审计。实现金融机构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框架作出首次披露，并根据实际在 TCFD 框架基础上拟定新标准，推动金融机构主动、及时、准确、完整披露相关信息，促进信息标准化，提升信息可靠性。推动金融机构公开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战略，对涉及重大 ESG 影响的授信或投资情况，构建申诉回应机制，接受市场和利益相关方的监督。

## 五、内地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建议

### （一）扩大金融开放水平，拓展香港金融发展腹地

推动内地银行业开放，支持香港银行拓展内地发展空间，研究推动符合规定的银行通过新设法人机构、分支机构、专营机构等途径在北京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天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内地对外开放平台开拓业务，支持在内地发起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理财公司。推动内地证券业开放，在除粤

港澳大湾区外的自贸试验区设立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推动内地保险业开放，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保险机构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设立经营机构，研究在 CEPA 框架下支持香港保险业在内地更大范围设立保险售后服务中心。支持符合规定的香港企业在内地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有序扩大发行主体和工具类型。

### （二）强化重点领域应对，降低逆全球化负面影响

制定出台支持香港证券市场扩容及内地证券市场国际板探索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健全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吸引更多境外企业到香港乃至内地上市，携手提升中美证券市场的对等性。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跨境自由流动性，减少对 Swift 等现有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将交易置于美国控制的连接点之外，并在小范围内尝试将人民币作为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形成区域内循环。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投融资合作为抓手，争取更多国家（地区）对构建美元体系以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认可和支持，共同提升中国的金融话语权。

### （三）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共同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构建香港与内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强化金融监管沟通，共同解决跨境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推动健全创新领域金融监管规则，研究建立跨境金融创新监管“沙盒”，协同开展跨境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强化跨境金融风险研判和关键领域风险防控，健全分析监测及风险预警体系，及时提示金融风险，完善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深化跨境金融机构监管和资金流动监测分析合作，促进金融机构提高对跨境资金异常流动的监测力度，加强信息交流机制建设，增强打击逃税、跨境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有效性。

### （四）推动重点区域交流，提升内地金融发展水平

推动香港和海南的金融合作，推动更多香港银



行、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金融机构在海南落地，支持设立由港资控股或全资持有的人身险公司，支持港资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理财公司，支持香港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支持港资设立控股或全资持有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发挥香港金融市场建设经验，协助海南推动碳汇、热带农产品、海洋油气资源等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争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深化香港和重庆的金融合作，借鉴香港在贸易金融服务、物流金融服务、保险综合服务、跨境支付服务、金融信息服务等方面的经验，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吸引香港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在渝企业创新，通过共同发展科技金融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渝港金融人才联合培养，推进从业人员培训合作和资格互认。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 中国内地国际收支格局和香港金融中心的新定位 [J]. 开放导报, 2020 (3) : 14-21  
 [2] 冯邦彦、彭薇. 香港与伦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比较研究 [J]. 亚太经济, 2012 (3) : 87-92  
 [3] 李玉姬. 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研究 [J]. 特区经济, 2021 (11) : 22-25

[4] 刘尚希. 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政策内在逻辑发生新变化 [J]. 财政科学, 2021 (4) : 5-8+20  
 [5] 马莉莉. 大变局下香港建构“双循环”“联动枢纽”研究 [J]. 港澳研究, 2021 (2) : 46-56+95  
 [6] 孙煜. 助力香港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升级版 [J]. 中国金融, 2022 (13) : 35-37  
 [7] 汪小亚. 从国际金融中心迈向全球金融中心 [J]. 中国金融, 2021 (2) : 67-69  
 [8] 王晓阳. 建设中国特色国际金融中心的途径选择：以上海为例 [J]. 经济资料译丛, 2015 (1) : 24-33  
 [9] 肖耿. 香港缘何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J]. 中国金融, 2017 (13) : 15-18  
 [10] 张天桂、尤安山.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与路径选择 [J]. 港澳研究, 2016 (4) : 39-51+92-93  
 [11]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 Taylor, P.J. Specification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01(2): 181-194

(责任编辑：冯天真)